

容 閔

唐仕进



容 閔（1828—1912）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华侨和教育家。他早年留学美国，是中国第一位在外国高等学府毕业和学士、博士获得者。他归国服务六十年，致力于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状况，积极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发展资本主义。他访问过太平天国，参与了中国近代最早引进外国先进机器设备的

实践，参加戊戌维新运动，晚年支持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事业。他还首倡和主持了中国官派青少年出国留学事业，开创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史的先河。容閔的一生，是

热爱祖国的一生，是不断追求进步和探索的一生。为纪念他对祖国历史的贡献，后人在他的坟墓前竖立了纪念碑。上海交通大学为他建筑了容闳纪念堂（今交通大学办公大楼）。1983年他的家乡珠海市举行了他的诞辰纪念活动，并塑立了纪念雕像。容闳爱国爱乡的光荣事迹，永远鼓舞家乡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美好家园的信心。

第一位留美大学毕业生

容闳字达萌，号纯甫，公元1828年11月17日（清道光八月十一日）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南屏乡（今珠海市南屏镇）一位贫苦农民家庭。南屏旧称沙尾，四面环水，与澳门五里之隔。南屏容姓始祖，自南宋时从新会县荷塘村迁来，至容闳已为第十六代。父亲容丙炎，母亲林氏，以租地三亩及打捞鱼虾为生，容闳有一姐、一兄、一弟，五口之家过着贫寒生活。1835年容闳七岁时，父亲在澳门打工，携容闳到澳门一家英国传教士所办的西塾读书，鸦片战争爆发后，西塾停办。1840年秋，容闳之父病逝，家计益困，十二岁的容闳不得不到邻近村贩卖糖果以助家计，有时随姐姐到田间去拾稻穗。有一次一位田间农民见他活泼可爱，与他攀谈，容闳背诵了英文二十六个字母，农民送给他一捆稻子。稍后，容闳又赴澳门，在一家天主教士办的印刷厂当了童工。

鸦片战争后，美国传教士布朗夫妇来澳门，在原来停办的西塾基础上重办了一间玛礼逊学校，免费招收原来

的学生，容闳又得到了读书的机会。香港割让给英国后，玛礼逊学校迁香港，容闳也随校赴港就读。这时玛礼逊学校的中国学生从七人增加到四十多人。容闳与同邑的黄胜、黄宽（今属中山市）以及唐廷植、唐廷枢、唐廷庚兄弟（今属珠海市）等友善。

1847年，布朗校长因病返回美国，他是耶鲁大学毕业生，临行时想带几名中国学生赴美深造。容闳、黄宽、黄胜表明了愿意同往的决心。他们乘坐装茶叶的美国帆船，从广州出发，绕道好望角，登上太平洋彼岸。这就是中国近代最早一批的留美学生。他们首先被安置在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相当于高中。后来，黄胜因病中途退学返国，容闳、黄宽读完高中课程。容闳聪明勤奋，颇受老师赏识。有一次，老师带着全班学生到海边，指着一块石碑，要求学生们在涨潮前抄完碑上的英文。绝大多数碑文未抄完时，潮水已淹至碑文的下半部，正当大家望碑兴叹时，容闳仍从容不迫地继续抄写，原来，他是逆着碑文从下往上抄录的。从此，这位聪颖的中国学生在老师和同学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中学毕业后，黄宽接受香港某英商赞助，转到英国学医，容闳却面临着前途的选择。美国某教会看中容闳，以容闳回中国当传教士为条件，答应送容闳上大学深造。虽然这时容闳已加入了基督教，但认为当传教士，有背于自己“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的理想，拒绝在教会“志愿书”上签名。后来，还是靠老校长布朗的努力，争取了佐治亚州一妇女组织的支助，容

因于 1850 年考上了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

容闳修业耶鲁大学文科，但学习并不顺利，他的数学基础不好，时常担心留级或被除名，经过较长时间的努力，才渐渐赶上。他的学习费用，也很缺乏，就靠平时为学生俱乐部采办膳食或到图书馆帮忙，半工半读坚持到大学毕业。他留学他乡，心系祖国，曾多次去信朋友卫三畏，请他告诉国内的消息，当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美国时，引起他极大的兴趣。在大学期间，容闳就立了自己的志愿：“籍此时学习，以为将来效力祖国之预备，守此宗旨，八年如一日”，“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1854年，容闳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学校以有史以来出现了第一位华人毕业生为殊荣，毕业典礼盛况空前，很多学者从各地赶来参加典礼，看看这位中国人。一些商人和研究团体也纷纷向容闳提出了留在美国的优惠条件，但容闳早有思想准备。当一位同学递出笔记本要容闳签名留念时，容闳毫不犹豫用自己不熟悉的中文写上“其赤子之心，大人者不失”。他选择了归国服务的道路。

“谋食亦谋道”

1854年冬，容闳经过154天的帆船飘泊，回到了香港，次年四月回广州。在美国时，他就感到自己汉语的不足，归国途中与船夫交谈，也觉得汉语水平肤浅，因此回

国后第一件事就是补习汉语。为此他在广州停留了四个月。这是，他亲眼看到两广总督叶名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影响的天地会起义惨状，产生了对天地会的同情，从而也加强了他改造中国的决心。但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这位洋学生的资历并不引起社会重视，加上他出身贫寒，官场没有亲友，不得不自谋职业。即使到处受到冷遇，他从不放弃自己的理想，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谋食亦谋道”。

1855年，他先在广州担任了美国驻华代理公使伯驾的书记。伯驾原是1844年逼迫清政府与美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中美望厦条约》的传教士，对容闳的救国主张反应冷淡，也不愿帮容闳的忙。容闳于是离开了他。后来，容闳又去了香港，当了一名律师，又被英籍律师排挤，失了业。他转辗到上海，在上海海关总税务司处当翻译，月薪七十五两。对容闳来说，这已是一个比较优厚的待遇，但他对海关勾结外商贪污走私的行为，十分愤慨，特别是获悉海关税务司总是由外国人担任，更加不满。他曾质问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中国人能不能担任总税务司。李泰国回答绝对不可能。容闳立即提出辞职。李国泰提出同意将他的月薪提到二百两。容闳不为所赂，坚决离开了海关，其后以译书糊口。

1857年，容闳进入英商宝顺洋行任书记，与在该洋行任职的同乡徐润（今珠海市北岭人）相识，建立了友谊。他保持着中国人的骨气，洋行总经理委他为日本长崎分公司的买办。他认为“俸虽高，然操业近卑鄙”，宁愿当

普通职员而不肯当买办。总经理对这位虽然贫穷、但“傲骨殊棱棱”的中国人也发出了赞叹声。有一次，容闳在一间拍卖行里，一位个了高大的苏格兰人玩弄他的辫子，并要把它剪掉，侮辱容闳。容闳一气之下，将这位洋人打得鼻歪目斜，血流满脸，一付狼狈相。在“国中之国”的租界里，洋人欺侮华人是经常的事，华人只能吞声忍气。容闳的行动，为中国人出了一口气，于是名声大振。同年，黄河大水决口，容闳又一次迸发救民之心，虽经济力量薄弱，却牵头组织救援组织，筹得款项二万元，捐送灾区。整个上海更加知道了这位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生，许多人与他交朋友，其中有化学家徐寿、数学家李善兰等。徐寿（一说徐润）还介绍一郑氏女与容结合，郑氏后生子容若兰。

容闳在宝顺洋行任职期间，正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发展的鼎盛时期，早在美国留学时的容闳就对太平天国发生兴趣；回香港后，又认识了洪秀全的堂弟洪仁玕。其时容闳常在江西、湖南等地采购茶叶，有机会看到太平军管辖的地区，人民安居乐业，产生了向往太平天国的念头。1860年11月，容闳约了两位美国朋友，从上海出发，专程访问太平天国，途中遇到戒严，两位美国朋友害怕，想返回上海，经容闳劝说遂再同行。此时洪仁玕已受封干王，总理着太平天国军政，对容闳的来访给予了热情欢迎和接待。容闳对着这位老朋友，毫不犹豫地 toward 干王提出了七条他思虑已久的主张：一、建立正规化的军事制度，组成一支有纪律的部队；二、设立军事学校，培养

有学识的军官；三、设立海军学校；四、组织健全的政府，聘请有政治经验的人充当各部门顾问；五、创立国家银行制度，订出统一度量衡标准；六、制定各级学校的教育制度，把“圣经”列为主要课程之一；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这些建议，包括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反映了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在此以前，还没有人提出过这种主张。正如历史学家范文澜指出的，容闳是中国改良主义的创始人。

洪仁玕很赞赏容闳的建议，与容闳就所言七事，逐条讨论，谓何条最佳，何条最要，侃侃而谈。但是，由于太平天国正忙于军事上的事情，领袖们对容闳意见的认识也不统一，容闳的建议也同洪仁玕提出的《资政新编》一样，未能实行。干王报禀天王洪秀全，封容闳“义”号爵位，留其在天国任职，容闳还是怀着失望的心情回到上海。虽然如此，容闳对太平天国不断有新认识，他后来对人说：“当时即无洪秀全，中国亦不能免于革命，恶根实种于满清政府之政治”，承认太平天国是“革命”。

容闳对美国归来的十年经历，自称为一生的“黑暗时期”。尽管他多次更换职业，为生活之计而奔波，但爱国热情一天也不减弱，他在谋求改造中国的方向上不断探索。

在洋务运动中

1863年，容闳经好友李善兰的引荐，在安庆受到了两

江总督曾国藩的接见。曾国藩正受命总揽镇压太平天国的军政，是清廷重要的封疆大吏和当权派。曾国藩从镇压农民反抗的阶级利益出发，主张引进外国先进设备，强化军事工业，经清廷中枢奕訢等实权派支持，遂掀起了一场洋务运动。曾国藩办洋务，正急需一批人才，他与容闳交谈中，发现容闳学识渊博，对外国情况十分熟悉，遂留容闳在他幕府。容闳投身洋务运动，度过了二十年的生涯。

容闳之所以为曾国藩卖力，除了对清廷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外，还反映了我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对封建势力的依附性。他认为改造中国只是上层的事情，企图通过清廷实权派来实现他的救国主张。从美国归来时，容闳就拟定了一个实施教育救国的计划，他希望能够通过为清廷谋事的表现作为实施他教育计划的条件。即使他与曾国藩办洋务的出发点不同，曾国藩以发展军事工业为主，容闳主张发展民用工业，曾国藩主张引进加工机械，容闳主张引进工作母机，但是当曾国藩要他赴美购买一批机器设备加强军火厂时，容闳还是答应了。1864年，容闳携带了三万两银子，赴美国周折了一年多，采购了机器一百多种，于1865年9月返回上海，曾国藩和江苏巡抚丁日昌将这批机器安置在上海江南制造局（今上海江南造船厂）。尽管此举纯属军事目的，仍不失为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引进外国先进机器设备的活动。曾国藩保奏他获得了五品候补同知衔，又兼任江苏巡抚衙门译员。其后容闳在洋务派要员、广东同乡丁日昌身边任职。丁日昌对中国近代化工业发展建树颇多，多为容闳之助。

容闳主张引进先进设备与引进相应科学技术并重，并对先进技术吸收与消化。1867年，曾国藩视察江南制造局，容闳乘机向曾提出在制造局加设一间机械学校。计划在这个学校里招收部份青年从事工程学的理论和实践教育，“使中国能及时地免以雇用外国工程师和机械师，而能完全独立自主。”体现了容闳教育与生产相结合，引进为独立自主服务的思想。期间，容闳亲自翻译了《地文学》、《契约论》的有关章节，介绍西方的人文知识和社会学说。

洋务运动中引进“制军器之器”与“制器之器”之争，反映了洋务派官僚与民族资产阶级在引进方面以军事工业为主或是民用工业为主的不同立场。容闳积极主张引进民用工业。1867他通过丁日昌上书军机大臣文祥，建议创办一家华人轮船公司。容闳起草了一份《联设新轮船公司章程》，报呈曾国藩。章程以西方股份制为基础，在资本、股份、管理方面完全仿效西方资本主义方式，提出了与洋人争回河运权益的主张。这是我国第一份股份制资本主义企业章程，由于清政府着眼点在于发展“制军器之业”，对这个纯民用工业不予重视，结果容闳的主张被置于高阁。但是容闳的主张在社会上已发挥深刻影响。1871年李鸿章在采纳了容闳和其他人的建议，创办了轮船招商局，后又委容闳的好友唐廷枢（容闳香港玛礼逊学校同学）、徐润为招商局总办和会办。轮船招商局成为中国近代大型航运方面的第一间民族企业。

在洋务运动中，容闳坚持民族立场，处处维护国家利益。他虽然留学于美国，却对美国的旗昌洋行在长江横行

霸道，大为不满，大声疾呼：“汉口之轮船，俱为旗昌一家所得，由此垄断独登，操纵由己，不诚于我中国商人大有窒碍乎”。他虽然加入了基督教，但极力反对教会干涉中国内政。他上书军机大臣文祥说：“中国政府宜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诉讼，以免引起纠纷，盖教会干涉诉讼，一方又损害法权也。”表现了他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1871年，英商在上海创办了《申报》，后又有《字林西报》问市。西报言论多偏袒外国侵略者，容闳对此心中不快，决意办一家华人报纸，与洋人报刊对论。在好友唐廷枢、同邑人上海知县叶顾之的赞助下，容闳于1874年办起了上海第一家华人报纸《汇报》。容闳在社论中发表了报纸的宗旨：“本局为中华日报，自宜求有益于华之事而言之，故有裨于中国者，无不直陈，而不必为西人讳”，表现了反侵略的立场。《汇报》是我国近代第二份华人自办的报纸（第一份华报比汇报早创五个月，在香港发行），与上海的侵华喉舌进行了辩争。其后容闳的主要精力放在主持留学生教育方面，而且自己不在国内，《汇报》办了一年半而停办。

1874年，容闳在美国主持留学生教育事务。秘鲁派出专使，赴天津会见直隶总督李鸿章，吹嘘华人在秘鲁如何受到优待，华人营业如何发达等。李鸿章委托容闳将情况汇报国内，容闳带了两位美国朋友，到秘鲁、古巴调查，结果与秘鲁使者所说情况完全两样，容闳拍摄了华工在秘鲁受虐待的照片二十四张，加上一份详尽的报告，寄回国内，戳穿了秘使的谎言。在秘鲁期间，容闳召集华人收

集情况，获悉有相当多人契约已满，希望返国，却受到秘方的阻挠，容闳即与秘鲁政府官员争辩，秘方当场批准八十六人返国。其后，中秘交换了照会，秘方提出了“保护华工”的保证。

1876年，近代爱国思想家郑观应（香山人）创办中国第一家棉纺厂——上海机器织布局，在技术上遇到困难，去信美国的容闳，请求帮助解决。容闳请了一位专家丹科来上海，协助郑观应。丹科以中国棉花为原料，经过试验，适用于美国的机器，使郑观应的织布局不需进口美国棉花为原料。

1894年，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失败，洋务运动中二十多年积累的军事力量几乎全部丧失，宣告了洋务派通过办洋务强化国家统治机器的目的破产。但是洋务运动中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成份却对封建经济体制发生了冲击作用，容闳等一批有识之士继续为发展中国资本主义而继续努力。1896年，容闳向清政府提出创建国家银行的计划，翻译了部分美国的银行章程上呈，取得了户部尚书翁同龢、侍郎张荫桓的支持，准备派容闳赴美考察，受到了顽固派的阻止。1898年，容闳又提出组织全国铁路公司的建议，计划修筑天津至江苏镇江的铁路，清政府已予批准。可是当德国以侵犯其山东势力范围的利益提出抗议时，清政府又改变了主意。容闳十分气愤，他大声疾呼：“自己的国家在自己的土地上修筑铁路都不行，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法律！”

首倡官派留学教育

容闳投身洋务运动二十多年，成就最大者为首倡中国政府官派青少年出洋留学，并主理了这项前所未有的事业。

容闳在美国接受资产阶级教育的同时，就注意了美国文明与国内政治经济落后状况的比较，逐渐产生了教育救国的思想。他认为，要改造中国，必须有千百个“容闳”，这些“容闳”脑子里装满西方文明，事情就好办得多。在归国的时候，他就草拟了一个组织大批青少年赴美留学的计划，并把这个计划的实现寄托了上层人物身上。当在洋务运动中取得了洋务派官僚的信任及晋身官吏行列后，容闳随即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主张。1867年，他先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向军机大臣文祥提出了选派聪颖幼童赴美留学的意见，正逢文祥丁忧离职，事情搁置了下来，但容闳并不气馁，继续多方寻找实施这个教育计划的机会。1870年，容闳作为丁日昌随员协助两江总督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又有机会接触了曾国藩。容闳抓紧机会对曾重提派遣留学生事。容闳的主张与曾国藩办理洋务需要人才的情况相符，便与李鸿章一道向清廷奏报，获清廷批准。当时中美签订了一个《续增条约》，规定中有一条美国允许中国人到美国读书，为这个计划提供了依据。容闳获悉他的计划被接纳，欣喜若狂，夜不能寐，“竟夜开眼如夜莺，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床第间”。

清政府批准容闳的教育计划是：四年内每年选派十

至十二岁幼童三十名共一百二十名到美国留学，学费由政府提供，学业为十五年，学成后归国。清政府成立了一个幼童出洋肄业局，由刑部主事陈兰彬（广东吴川县人）和容闳任正副委员，负责挑选幼童事宜，实由容闳主责。肄业局在上海办了一间预备学校，对各地挑选来的幼童进行初步的基础训练，聪颖者再遣派赴美。出洋留学是一件新鲜事，加上离乡背井，风险很大，一般富有人家，不让子弟远行，而贫穷之家子弟，又欠缺教育基础而难于入选，容闳的招生遇到困难。经过容闳同乡好友、上海实业界著名人物唐廷枢、徐润的积极襄助，才解决了第一批的生员问题。期间容闳也返回香港和老家广东，挑选生员，皆因广东当时得风气之先，已有许多人出洋谋生或经商，特别是香山县，一些贫苦家庭子弟均有机会接受过教会教育或在港澳读书，这些子弟的父母思想又较开放，也允许子弟远行，因此第一批入选的30名幼童中，广东就占了24名，香山县占了13名，容闳、徐润、唐廷枢家乡均有子弟入选。在招生名额满后，容闳先赴美安排，他广泛联系美国的朋友，为幼童落实了食宿和合适的学校。在准备工作就绪后，1872年，詹天佑等30名幼童由陈兰彬带领赴美，这就是中国近代第一批官费留学生。

1875年，四批幼童共一百二十名全部赴美，他们安排在护士、教师、医生等美国中小知识分子家庭中，经过一段时间后，分别进入小学、中学。清廷派陈兰彬、容闳为正副监督，管理留学生事务。陈兰彬虽为正职，但正如李鸿章所说，他一旦离开容闳，则“迷于所往，寸步难行”。

因此实际负责乃为容闳。为实现他的抱负，容闳把全部精力投放在培养这些留学生的身上。1875年，清廷改任陈兰彬和他为中国驻美正副公使，在职务上是提升了。但当他知道留学生事务由清廷另派人管理时，容闳立即请求不担任副公使，仍管留学生事务。清廷答应他任副公使兼管留学生事务，容闳方才接受了新职务。由于容闳的努力，清廷在康狄涅格州哈脱福特城的格林街上建筑了一间留学生事务所。容闳与留学生们不时在事务所叙会。他没有官架子，知识又渊博，与学生们谈笑风生，有时带他们到外地旅行，与学生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对一些学习和生活有困难的就积极帮助解决。由于他的关系，美国主人对住在他们家的中国学生都十分爱护。他们学习上进很快，极少有留级现象，从小学、中学到升大学，都比较顺利。

清政府派遣幼童留学，目的是培养为他们服务的奴才。遵循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封建教条，清廷派出经师赴美，加强对学生封建礼教方面的灌输。但事与愿违，这些留学生本来就很单纯，在美国生活已经对封建伦理道德不感兴趣，他们组织了棒球队，有时参加舞会，穿西装，有的还剪掉了辫子，监督陈兰彬深感不满，但容闳听之任之，因此陈、容之间产生了隔阂。陈兰彬多次报告李鸿章，谈了容闳与留学生们的“越规”行为，李鸿章听信陈的言词，遂派吴嘉善为留学生监督，罢免了容闳对留学生事务的管理权。吴嘉善思想极其保守，召见学生时要学生行叩跪拜礼，不从者用鞭子斥之，被学生们称为留学

界“大敌”。更有甚者，陈兰彬、吴嘉善不惯美国生活，希望内调以获晋升机会，竟不顾学生们的前途，谎报留美学生已完全不能造就，要求撤回全部留学生，以便使他们自己也能返国。李鸿章对派遣留学生事前与曾国藩商定时就不如曾坚决，曾国藩死后虽由他接手，但这时他另有向欧洲派遣留学生计划，遂下了决心上报清廷，于1881年撤消留学事务所，撤回全部赴美留学生，并把陈兰彬、容闳、吴嘉善一齐内调。容闳派遣留学生的计划，本应1885年才能完成，当他获悉消息后，仍做最后努力，他发动了美国前总统、耶鲁大学校长等知名人士写信清政府总理衙门，请求收回成命，也无济于事。这时留学生除詹天佑两人大学正式毕业，唐绍仪数人就读大学外，其他大部分仍在中学。

容闳“教育救国”的理想虽然破灭了，但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却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开创了官派留学教育的先河，使出洋留学成了一种社会风气，促使了以后留欧、留日运动的发展。留学生回国的活动，对封建体制起了冲击的作用，许多留学生后来成为民主革命的骨干。就容闳这次失败了的教育计划来说，也有成功的地方，在容闳爱国思想的影响下，他的一百多名学生对祖国都做出了不同的贡献，詹天佑成为我国近代著名工程师，容闳的族弟容星桥加入了兴中会，唐绍仪、蔡廷干分别担任了民国总理、代总理、梁敦彦、梁如浩担任外交总长，徐振鹏担任海军舰队司令。他的学生中，有七位在中法、中日战争中为国捐躯。正如《中国近代留学史》一书中指出：

“欲述留学生之渊源，不可不先知容闳。”

从维新到革命

1881年清廷撤回留美学生后，容闳、陈兰彬、吴嘉善均同时返国。在美期间容闳娶了克洛小姐为妇，生下两个男孩。克洛以为容闳是被清政府拿回治罪，忧虑成疾。容闳闻讯，不得不重返美国，克洛经救治无效死去。容闳为照顾两个小孩，在美国居留了十多年。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容闳在美国听到中国战败的消息，又激起了他的爱国热忱。他写信清廷湖广总督张之洞，要他制定与日本长期作战的计划，建议向英国借款，雇佣外国军队从背后袭击日本。张对容的建议很感兴趣，请他赴伦敦借一千五百万英镑以充军用。英国政府虽对日本野心不满，但也不愿中国强大，拒绝借款。容闳伦敦之行一无所获。张之洞电邀容闳返国，容将两个孩子托付克洛的姑母，于1895年夏回到武汉。容闳再一次向张之洞重复了他的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的主张。张认为他的言辞过激，置之不用，只给了他一个“交涉委员”的空衔，而无一事可干。他只好辞职去了上海，后携带上海的原配妻子郑氏及所生之子返家乡。1896年闻讯北京正酝酿维新改良运动，容闳留下了家人，只身又到了北京。

容闳在北京很快与改良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交上了朋友。他们都是广东人。康、梁对容闳过去的许多主张很赏识，尤对1896、1898两年中容闳提出的创建国家银

行、自办铁路的主张，更与他们主张的“新政”不谋而合，因此不时在一块磋商国是。1898年维新运动期间，许多重要会议都在容闳的住所召开。容闳对外国情况的谙熟、丰富的经验和成熟的政治见解，都受到维新派领袖们的尊重。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捕杀维新党人，下令通缉容闳。容闳在紧急情况下，仍跑到美国公使馆，请求他们搭救康有为、梁启超。他自己只身逃到上海，在租界中躲避。

康有为、梁启超跑到外国后，国内的维新运动余波未平。1900年7月，唐才常在上海成立“自立会”（亦称“中国国会”）参加者有当时的名流八十多人，会上举行选举，容闳得票最多，被选为会长，严复次之为副会长，唐才常当总干事。国会的宗旨是组织新政府，拥立光绪皇帝重新执政。会上，容闳起草了英文宣言，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参加会议的章太炎并不十分拥护改良的主张，但被容闳的热情所感动，他写道：七十多岁的老人，还这样关心国事，真是中国少有。

但是自立会的活动也成不了气候。唐才常在武汉组织自立军，准备武装起义，但不到一个月，就被张之洞捕杀了，容闳再次被通缉，先后逃到日本、香港等地。

正当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政治舞台上与封建势力竭力搏斗的同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在形成之中。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组织了“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宗旨，并且开展了一系列反清活动。在康有为、梁启超从资产阶级改良派转为保皇派后，容闳由原来的康梁之友转到了支持孙

中山的立场。

1895年以后，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在香港设立总部，香港成了革命党人反清的一个基地。1900年，原留美学生、容闳的族弟容星桥，正在香港为孙中山办报纸。容闳通过他与兴中会取得了联系，尤其是与兴中会员、爱国华侨谢纘泰交谊更深。

1900年9月，容闳赴日本，临行前，谢纘泰告诉了孙中山正在日本活动的情况，希望他能在日本见到孙中山；同时，又写信孙中山，告诉了容闳的行程。9月1日，容闳在轮船上与孙中山不期而晤，两人一见如故。孙、容两人一起在日本走访了许多朋友，共商反清事宜。在容闳的印象中，孙中山很象美国的华盛顿，富兰克林。孙中山认为容闳有新思想，是热心改革中国的老前辈。于是两人建立了友谊。

腐朽反动的清政府时刻都想把革命扼杀在摇篮中。孙中山自从开展反清活动以来，在国内一直受通缉，只好在国外开展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容闳由于参与了唐才常自立军起义的策划，清政府也一直不放过他。1901年，香港兴中会总部的重要负责人杨衢云被清政府派人刺杀，容闳认为香港也无法安身，于是再次去美国。

1902年5月，容闳乘轮赴美，临行前，他再三叮嘱前来拜访他的刘禹生：中国现在的斗争与美国独立战争一样正义，我已经老了，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希望你们都做实际工作，“有为中国人之心，即日日应办中国人的事。”

这时候容闳对劳动人民斗争的历史作用，也有了新的认识。他对1900年发生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有很高的评价，他对刘禹生说：“（义和团）此中国之民气也，民无气则死，民有气则动，动为生气，从此中国免瓜分之局。”这种评论与中外反动派把义和团称为“作乱”、“拳匪”的诬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容闳在美国大陆一直与谢缵泰保持通信联系。谢缵泰写信容闳，请他发动美国友人支持中国的革命斗争，容闳表示应允。当时，资产阶级中革命与保皇两条阵线还未鲜明，孙中山组织反清活动曾一度想康有为、梁启超参加。这时容闳与康梁的关系也很密切。1903年和1905年，康有为、梁启超分别来到美国，会见了容闳。梁启超说容闳“舍忧国外，无他思想，无他事业”。1907年，孙中山通过《民报》阵地，发动了向保皇派的革命大论战，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就在同一年，容闳宣布与康梁决裂。1909年，孙中山旅居新加坡，容闳与孙中山通信频繁，成了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同路人。容闳在美国有两位朋友，一位叫荷马·李，他对军事很有研究。另一位是布司，是美国财界人士，这两人以前都对康有为、梁启超有交情，容闳写信叫他们转向支持孙中山，并介绍孙中山与他们取得了联系。

1910年3月，孙中山到美国，在洛杉矶与荷马·李、布司等人见面，并制定了武装起义的《红龙计划》。同年4月，孙中山特地赶到容闳居住的哈特福德城，拜访这位老朋友。1912年1月，孙中山带着荷马·李回南京。他就

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还十分怀念容闳这位“老同志”。

1911年5月，容闳突患中风，卧床不起，生命进入最后时刻。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二千年的封建体制被赶下了历史的舞台，消息转到美国，容闳拖着疲乏不堪的病体，连连给谢纘泰写了三封信，可见当时的心情何等喜悦。容闳告诉谢纘泰等身体状况好转，就回国看看辛亥革命后的新气象，期间，并想结识一些与孙中山共事的其他领导人。

当时国内在举行南北议和谈判，容闳的学生唐绍仪当了袁世凯的谈判代表。容闳对这件事很关心，他写道：“目前使我焦虑的是掠夺成性的列强在北京，将有压倒一切的力量，左右袁世凯，唐绍仪一伙；他们将使用一切手段，影响上海的制宪会议，通过君主主宪，并以袁世凯、唐绍仪控制新政府，那简直就如满清政府一样糟糕。”为此，他大声疾呼：“一点儿也不要相信他们这一套，一点儿也不要相信袁世凯通过他的喉舌唐绍仪对你们说的话……”

1912年1月，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很想念这位在美国的老朋友。他特地写信给容闳，请他回国参加国内新的斗争，并寄去一张相片，信中写道：“当此破坏后，民国建设，在在需才。素仰盛名，播震寰宇，加以才智学识，达练过人……恳请先生归国，而在此中华民国创立一完全政府，以巩固我幼稚共和”。

这时，容闳已处于昏迷状态，但当他得知孙中山来信

的内容后，鼓励身边的两个孩子说：你们回国吧。在美国长大、并且已经都是耶鲁大学毕业的觐彤、觐槐，感到十分突然，对父亲此举不很理解。他们觉得自己在美国都有工作，待遇优厚，为什么要回中国受苦呢？儿子支支吾吾的态度使容闳有些生气了，他说：“我培养你们，原希望就是回报祖国，现在你们如此患得患失，太辜负我的愿望了。”说得两个孩子都惭愧地低下了头。后来，觐彤、觐槐终于感于正义，遵循父亲的遗训，回到了中国。

1912年4月12日，容闳逝世于美国哈特福德城的寓所。消息传出后，反响强烈。《纽约时报》、《哈城日报》都作了报道。他的好友、牧师特韦契耳为他主持了葬礼。特韦契耳对容闳的评价是：“他（容闳）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

家 乡 活 动

容闳在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活跃近六十年，在家乡也创下了光辉的业绩。

1855年4月，容闳经过一百五十多天的海洋颠簸，从美国返回香港，旋即回到他阔别八年的家乡南屏。他一头跪倒在年迈母亲的面前，诉说着他在美国的经历。母亲见他平安归来，十分欣慰，又对他按美国人的习惯蓄着胡子很不开心，遂对他说：“汝上有一兄尚未蓄须，故吾意汝去须为佳”，容闳即遵母命，剃去了胡子。他拜会了哥哥、嫂嫂，到乡亲家中走访，与当年与他一块劳动过的穷弟兄

们攀谈，丝毫没有一点洋学生的架子。

1871年，容闳第二次返回家乡，这时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他回乡目的，除了回香港、香山选拔留美幼童外，主要是为了实现在家乡创办一间学校的夙愿。容闳从美归来十多年，通过自谋职业和在清政府做官，积蓄了一些银子，这次回来，官封挑选幼童的“钦差大臣”，挂二品大衔，乡亲得知消息，纷纷在村口迎候，观看容闳鸣锣开道，衣锦还乡的场面。谁知容闳既不坐轿，也没有兵勇跟随，只身回到乡里，晚间就在祠堂的角落住了下来。他家有间房子，母亲去世倒塌了一间，另一间由他哥哥居住，乡亲劝他多住些日子，购置一些房产和田地，他却把族长和老人们召集过来，商讨在家乡办学之事。南屏是有着三千人口的村镇，自古以来没有学校和私塾，只有一间历史沿习下来的封建神社组织“甄贤社”，容闳建议在这个基础上办起一间甄贤社学，他把身边的五百两银子留下来，就动身赴美国主持留学生事务去了。其后，他又从美国寄回了三百两银子，终使甄贤社学于1872年开办，成为广东近代最早的华侨学校之一。其后甄贤社学发展为甄贤学校，培养了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等大批优秀人才。近代著名学者王韬，写了《征设南屏乡义学序》，对容闳创办甄贤社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1896年，容闳第三次返乡，与上次返乡相隔已二十五年。期间大部分时间在美国主持留学生事务，并担任中国政府驻美副公使。有十年时间是在美国照顾失去母亲的两个儿子。他是获闻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消息而赶

回国内的。这时，他与上海原配郑氏所生之子容申，已二十五岁，已到结婚年龄。这一次他带着郑氏和容申回来，为的是进行“入族”仪式。按族规定，乡人在外地所生的儿子，必须回乡报告出生日期，由族里取族名。乡人根据字辈，为容申取名“若兰”，在家乡期间，容闳为若兰娶了媳妇，是邻村杨家之女。同时，容闳又为另两位美国出生的儿子举行了入族仪式。若兰的婚事刚办完，他听到北京正酝酿着维新运动，就把妻子和儿子留下，动身到北京去了。

1902年，七十四岁高龄的容闳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返乡。这时的容闳，已不是清政府的官员，而是参加维新运动和筹划自立军起义，被清政府通缉的要犯。他要逃到美国去，临行前再次返乡，与妻儿及乡亲话别。当他看到他倡办的甄贤社学规模日大，非常高兴，要乡人一定要招收女学生，并希望能够在美国听到在家乡办起中学的消息。临行前告诫他当年带往美国留学的堂弟容星桥，一定要照顾好甄贤学校。容星桥是兴中会员，正受孙中山之托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赴美以后，容闳多次来信询问甄贤学校情况，并不时寄回款项。辛亥革命后，容星桥辞去广东都督府交通司副司长之职，遵照容闳遗愿返乡管理甄贤社学，担任由甄贤社学发展而成的甄贤学校第一任校长。正因为如此，容闳爱国爱乡的事迹，长期在家乡流传，并写进了家乡的族谱。

容闳主理官派留学生事务期间，经唐廷枢、徐润等保举，香山县有四十名幼童赴美，占全部幼童一百二十名的

三分之一，其中容闳携带去的本乡南屏村幼童就有五人。他的长子若兰，其后子孙繁衍，后裔分布于家乡、香港澳门和内地。他美国妻子克洛所生两子，辛亥革命后均归国服务。次子容覲槐一度受胡汉民之命担任广东石井兵工厂厂长。覲彤、覲槐的后人今分布海外。